

和少英主编 ■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 第IX卷

人类学、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上）

Anthropology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和少英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实践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和少英主编 ■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 第IX卷

人类学、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上）

Anthropology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和少英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全 3 册/和少英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207-1

I. ①人… II. ①和… III. ①人类学-文集②民族学-文集③少数民族-西南地区-文集 IV. ①Q98-53②C95-53③K2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7796 号

人类学/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上)

和少英主编 ■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

著 者: 和少英
策划编辑: 邓立木
责任编辑: 李春艳 邓玲娜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总 印 张: 73.625

总 字 数: 1360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207-1

定 价: 180.00 元 (全三册)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编委会

学术指导：马 戎 杨圣敏 王铭铭 彭兆荣

主 任：和少英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兴东 王子华 王文光 王四代

王东昕 王正华 王亚南 王明东

王德强 邓立木 木基元 刘 江

刘劲荣 安学斌 李国文 那金华

杨宗亮 杨政业 张 跃 罗海麟

郑晓云 施惟达 赵丽珍 高登荣

黄建生 雷 兵 韩忠太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总序

民族学/人类学 (Ethnology/Anthropology) 学科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该学科人才荟萃, 成果丰硕, 可以说在全省乃至全国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在费孝通先生亲自创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指导和帮助下共建的省院省校合作“民族学重点学科”, 开展了对云南特有族群的较大规模调研, 对新中国成立前云南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点的追踪研究, 承办了教育部第四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暨国际学术会议, 组织编撰并出版了“云南民族文化史丛书”(共 25 本), 参与了国家民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的献礼图书《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共 28 本) 等重要书籍的编写工作, 既出成果又出人才, 将整个学科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众所周知, “社会文化人类学”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是民族学/人类学这个大学科中的核心分支学科, 主要侧重研究人类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以传承文明、发掘各类有益的“地方性知识” (Clifford Geerts 语) 以及开阔人们的眼界为己任, 以努力传播有利于增进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族群及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知识为职志, 进而为实现相互间和谐共处之目的服务。该学科具有“全观性” (holistic) 以及“透视性” (perspective) 等特点, 可以说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法国著名的“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将“理解他人的文化” (Understanding Other Cultures) 作为民族学/人类学这门学科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同费孝通先

生关于该学科应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为指导方针的主张，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无疑为我们廓清了诸多的疑团和迷雾，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们一定要沿着前辈们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为了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不畏艰辛、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力争使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并希望对全省乃至全国的学科建设有所裨益，我们不揣浅陋地推出了这套“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作为献给学界同仁以及即将于2008年在昆明隆重召开的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一份薄礼。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不断有更多更好的新作汇入这套丛书中来，为真正建成能够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增砖添瓦！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编委会

2006年3月于昆明

代序：漫漫求学路 苦乐满心田

三十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清晨，我正在家乡云南丽江一个偏远的小城里下乡当工作队员，突然听到了从广播喇叭中传来渴盼已久的恢复高考的好消息！但由于自己当时担任着那个据称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队的秘书，写材料等任务似乎又是须臾离不开我，所以对是否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参加高考的“私事”倍感犹豫。思前想后，漫漫求学路上的诸多往事，不由得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在丽江的一个纳西族家庭。我们民族历来以极其重视教育而著称，再加上父母亲望子成龙心切，我才五岁多就被送进了小学读书。“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年，我刚好升入了初中；高高兴兴地和同学们一块儿在手臂上带个“红卫兵”袖章，免费到昆明等地“革命大串联”了一番，算是开了点眼界。但串联回到丽江以后不久，便遭遇到漫漫求学路上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因学校停课而无奈在家中整整“待学”达三年之久！

好不容易盼到丽江地区中学于1969年“复课”，按当时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精神，仅用了4年时间就草率地结束了原先需要6年才能真正完成的全部初高中学业，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所谓的“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中度过的。好在当时遇到了几位不太那么爱“突出政治”的老师，教了我们一些英语、语文以及数理化等科目的基础知识；还有一位好心的图书管理员以及几位家中仍藏有一些图书的中老年人，也愿意偷偷地把书借给我这个好学的毛头小伙阅读，算是杂乱无章地读了些书。本来曾一度盛传要从应届高中生中统考一些国家急需的外语等方面的人才，但等到我高中毕业那年，又刚巧碰上“白卷英雄”张铁生要凭自己手上的老茧上大学之类的闹剧，使得自己的漫漫求学路上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

于是，只好下乡到当年红二、四方面军长征时渡过金沙江北上的著名的丽江石鼓渡口，在一个傈僳族村寨里插队当知青，一边担任生产队的会计，

一边在邻近的县立第四中学担任高中部代课老师。由于我教书颇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干农活和当会计等方面的表现也得到了广大傈僳族贫下中农的好评,所以两年的下乡插队期限刚满,就被首批推荐到丽江地区商业局车队当汽车修理工。次年,又被抽调到局机关当干部,并担任了局团委书记。这样一混又过了两年,转眼就到了1977年年底……

我感到恢复高考这样千载难逢的良机绝不容错过!于是便鼓足勇气向领导提出了要求参加高考的申请。尽管开始时确如原先所料碰了一鼻子灰,但我毫不气馁,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做工作。待到终于获得工作队领导和局领导的正式批准时,离参加高考的日子也就只有10多天了!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认真做准备,尤其是数理化等课程在四年多当农民和当工人的日子里几乎已忘得一干二净,但还是硬着头皮进了考场。在一场场考完后尽管觉得不甚满意,可是对自己能够上线还是充满信心的。没有料到左等右等,直等到整个录取工作都快要结束了,才好不容易收到了云南民族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原来是当时地区文教局的某些工作人员粗心大意,竟然把我的体检表忘记寄给省招办了!直到云南民族学院的录取工作人员肖仪老师注意到这一情况,并亲自发电报给丽江地区文教局负责招生工作的领导为一位素昧平生的考生追体检表,才勉强把我录取到该校的政法系本科学习。

接到云南民族学院那份白纸红字的录取通知书时,内心确实是感到五味杂陈:因为从这份录取通知书的内容来看,由于当时学校是第一次招收正规的大学生,不仅连学制都不甚了了,而且要求新生带进学校的必需品居然是一套《毛泽东选集》、民族服装以及劳动工具!就这么去入学吧,可以说多少有些不大甘心。要是不去入学,按理说地区文教局的同志会因为他们的工作失误而对我“网开一面”,按“特殊问题”处理而给我提供再次参加高考的机会的(按当时的相关规定,如考生已被录取而自己不愿去入学,就会被取消再次参加考试的资格)。但关键是自己在漫漫求学路上前前后后已经耽搁了七八年时间,确实不能再拖延了!我就这样在一种忐忑的心境中,跨进了云南民族学院的大门。

经过了四个寒暑的用功苦读,终于得以以各门课程总分排名全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其后又于1983年考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科社专业攻读研究生,1986年7月毕业并获法学硕士学位。由于我是云南民族学院建校历史上第一位研究生,毕业前夕学校党委决定派遣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刘瑞同志一行专程赴京,到中央党校要我回母校工作。怀着对民族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母校的一种感激之情,我便欣然回到了云南民族学院。

当然,我的漫漫求学路并未因此而中止,但限于篇幅不得不写简历似的

胪列如下：

1987年9月至1988年7月考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行“硕士后”研修，获两校校长共同签发的毕业文凭。1987年当选云南省党代会代表以及昆明市五华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至1989年）；并任云南民族学院党委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

1989年至1991年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人类学系研修一年，受教于这所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创建的名校中以“象征人类学”闻名于世的名牌系科人类学系。1992年初，在云南省首次组织的专业技术职务“破格”评审中被晋升为副教授，并担任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

1993年应美国福特基金会及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之邀赴美，遍访美国近20个州的高等院校、博物馆以及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进行交流考察，为规模宏大的“云南民族文化合作计划”的推进做准备。

1994年1~10月又应邀赴弗吉尼亚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担任高访学者，与该校学者开展合作研究。1997年再度被省高评委“破格”晋升为教授。并先后担任云南民族学院党委委员、学报主编，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以及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等职。

2001年初应云南大学之聘，担任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与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至今，这是当时该校唯一、也是全省唯一的一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2003年暑期，赴挪威卑尔根大学人类学系担任客座教授，与著名人类学家Fredrik Barth的高足Gunnar Holland教授一块儿合作研究，筹划了其后续至今的两校合作培养硕士生、博士生项目；并抽空游历了瑞典、丹麦、芬兰以及荷兰等北欧诸国。

2004年8月，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担任为期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这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许烺光、田汝康等先生曾就读过的著名系科，近年来在学科排行榜上一直都超越牛津、剑桥两所名校的人类学系而位列榜首。我觉得颇值得感慨的是：当年费先生的老师马凌诺夫斯基创办的那个闻名学界的“席明纳”（Seminar），人家可是薪火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每周五都在系资料室里如常举办……

其后，我又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各个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这一重大项目的主持人，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应邀赴意大利的洛克菲勒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学者（该中心规定每位申请者从第一次申

请到第二次申请中间需间隔十年,任何人终生不得第三次申请!);在米兰附近的阿尔卑斯山下、科默湖畔一座风景优美的名叫 Bellagio 的小镇中,编写完成了《生存在全球化的世界》(英文版)一书,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快乐时光!

近些年来,我还先后多次应邀赴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印度、土耳其、摩尔多瓦、老挝、缅甸、马来西亚、玻利维亚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等地从事学术交流活动。

自担任民族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以来,已培养博士生、硕士生近百人;并能在担任副校长暨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等管理工作之余,尽量抽出时间开展一些学术研究活动。现已出版的著译有:《生存在全球化时代》(英文版)、《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逝者的庆典》《纳西族文化史》《云南特有族群的社会文化调查》《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守望国境线上的家园》《人类学一百年》《重新把握人类学》《云南:联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以及《拉祜族文化史》等十余部,在国外书刊以及《民族研究》《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和省级报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本人有多项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一等奖等奖励,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云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并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称号。此外,先后主持完成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自然协会以及日本文部省等资助的中外合作科研项目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十余项。

漫漫求学路,对于我这个年近花甲的老学子来说,确实有苦乐满心田之感!而三十年前听到恢复高考消息那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清晨,将会在我的记忆长河中永驻!

(原载《中国民族报》“恢复高考30周年征文”)

目 录

也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 ——与黄万纶先生商榷	(1)
从何处突破?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9)
政治人类学浅论	(18)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的“象征人类学”教学与研究	(24)
纳西文化研究的拓荒者与奠基者——李霖灿	(28)
金平傣族的丧葬习俗及其灵魂观述论	(41)
“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辨析	(52)
中甸白地纳西族的丧葬礼仪	(60)
浅论藏文化与纳西文化之交汇	(71)
美国文化人类学现状	(80)
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分析模式的变迁	(88)
从纳西族的丧葬礼仪看人观	(99)
从比较的视角前瞻“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	(114)
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海外模式的启示	(120)
东巴教圣地纳西族的家庭结构与社会生活 ——中甸县白地水甲村的田野调查报告	(128)
全球化与海外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启示	(147)
旅游开发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	(167)
金平傣族的民间信仰探析	(179)
“化踪”：丽江古城纳西人社会整合中的文化自觉	(192)

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看文化建设	(203)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本体论”问题	(211)
天主教与滇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嬗变	(224)
金平傣族的泛灵信仰与心理健康	(236)
云南的民族学与人类学: 历史与现状	(254)
金平傣族的巫文化与心理治疗	(280)
桥头堡建设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295)
“归族识别”后克木人的认同与发展	(309)
纳西族的水文化与水智慧	(323)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族群边界演变	(355)
直苴彝族保保颇祭“尼”仪式研究 ——兼与埃里克·缪格勒商榷	(363)

也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

——与黄万纶先生商榷

《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三期所刊载的黄万纶先生写的《论马克思主义俄国公社的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一文（以下简称“黄文”），对探讨落后国家或民族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依据等问题，作了初步的尝试，读后获益匪浅。但是，对于文中所提出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似有进行商榷的必要。现不揣浅陋地将自己的粗浅之见写出来，以就教于黄先生及学术界诸前辈。

黄文的开篇介绍了一场发生于19世纪70~80年代初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论战，在简单引述了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及赫尔岑和特卡乔夫等人的有关主张后，便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农村公社问题的观点要比这些人高明得多，而且，“马克思也十分赞扬并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的主要内容到底是什么，黄文语焉不详；在遍览全文之后，也看不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下面，就让我们先来看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主要观点。

众所周知，在19世纪50—60年代，由于看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劳动群众所带来的灾难愈益严重，而1848年革命失败后各国风起云涌的斗争暂趋低潮，俄国知识阶层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幻想依靠本国的农村公社制度，人为地跳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潮。赫尔岑

^① 《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55页。

等人就把公社所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的东西,认为有了这些就比西方各国更接近于社会主义了,因此,俄国只需把各农村公社联合成一些大的村落,再使这些村落在联合的地方自治事业中结成统一体,“社会主义”也就实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思想的形成与阐发,主要也就是在上述思潮广为流传的这段时期。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57年所写的《论土地所有制》一文中,首次提出他自己关于经过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在《对反对村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等文章中做了更进一步的详细阐述。首先,他是主张应当保留农村公社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方面,他认识到农村公社制度不是俄国所特有的历史现象,它能继续存留下来便是俄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标志,这是他比赫尔岑等人高明的地方之一。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公社土地所有制有不少的优越性,如可以把农民从“无产阶级化的疾病”中解放出来,还能培养人们集体生活的习惯……

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看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错误地把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当成了保留公社制度的主要目的,这就难免使自己在看待其他相关问题时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哲学方面论证了公社土地公有制不应当让位于私有制,而应当直接向更高阶段的公有制过渡,因为:“1. 发展的最高点,在形态上,同它的起点相吻合。2. 当某一社会生活现象,在先进民族那里达到了高度发展时,在这个高度发展的影响下,在其他民族那里,这个现象会极迅速地发展,会越过中间的逻辑环节,从低级阶段直接进到最高阶段。”^① 这样的论证不过是较生硬地模仿了黑格尔哲学的三段式,虽不能说是科学的和真正有说服力的,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用它表述了自己关于俄国可以不要任何中间环节,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便能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思想。

那么,依靠什么力量,通过何种途径去完成这一过渡呢?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的农民正在农村公社里逐渐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因而也就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可以由少数知识阶层的“优秀分子”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强大的依靠力量。他看到农奴制与沙皇专制制度是阻碍俄国社会发展并使人民遭受饥贫的最大祸害,这样的罪恶制度必须坚决消灭!但这种制度的维护者们肯定会拼命加以保护,因此,就必须依靠农民的力量进行革命,推翻一切旧势力,为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扫清道路。——这就是车尔尼雪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4页。

夫斯基关于人民革命的思想，也正是他比赫尔岑等人以及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高明的地方。当然，仅依靠农民的力量是行不通的，因为当时的农民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①在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认为：公社占有制是过渡到公社生产的“必要基础和首要阶段”，而公社占有与公社生产又是进一步过渡到公社消费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只要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条件下，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使用，就可以说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了。在将来的新的村社中，人们不应仅简单地共同占有土地，还应按协作原则进行生产，把农业同工业融合在一起；然后，再进一步把农村公社将要实行的这种“协作原则”推广到城市生活中去，把分散的手工业联合起来，把工厂变为工厂中全体劳动者的财产，组织手工工场，进行共同劳动，这样也就在城市和乡村均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团所有制。不难看出，他们这些主张中包含有不少的空想色彩，这条道路也是根本走不通的。

在要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套理论的空想性质就颇为明显地表露出来了。他在《资本和劳动》等文章中阐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的计划，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借别人之口说出自己的看法——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善于在表述别人思想的同时寓寄自己的观点，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又一个特点。^②在《资本和劳动》一文中，他认为实现路易·勃朗的计划不应拘泥于任何地方，也不会限制任何人的自由，“谁愿意做什么，谁就做什么”^③；在未来社会中，人们的行动是绝对自由的，“住在你愿意住的地方，过你愿意的生活，只不过使你生活得又舒服又便宜，使你除了平常的报酬之外还得到红利。如果说这是限制人的，那么没有人禁止你放弃红利”^④。这样的自由，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上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大致观点。从中不难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些看法确实要比赫尔岑等人及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高明得多，但是在基本的方面仍然未能跳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窠臼。所以，列宁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⑤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生长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农奴制的客观条件不能为他提供制定更为科学的

① 《列宁全集》第3卷（新版），第146页。

② [俄]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页。

③ 《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0页。

④ 《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0页。

⑤ 《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5页。

社会主义理论的材料,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使他无法读到《资本论》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巨著,“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文化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①。因此,他的思想带一些局限自然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列宁所说:“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②,这就是鼓舞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同伴们进行革命活动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功绩就在于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同鼓吹革命、同号召与沙皇反动统治和农奴制做坚决斗争、同无情揭露自由资产阶级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俄国革命者。革命导师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把他称作“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③,列宁也称他为伟大的俄国革命家^④,马克思以前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⑤

在具体了解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论点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同科学社会主义体系是无法相容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本不可能“同意”这样的观点。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曾经想过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问题,这表面看来似乎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直接过渡”的主张是一码事,实际上两者却有着天渊之别!

试想:既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也不可能超出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加上他又是以一国的狭隘眼光去看待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可能会对这样的观点表示“同意”吗?!

二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然根本不可能“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那黄文的这一结论又从何而来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

黄文引以为据的是马克思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论述,作者是这样引述的:“马克思郑重地宣称:‘……至少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8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新版),第2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9页。

⑤ 《列宁全集》第31卷,第53页。